

抗日战争时期 广州妇女运动概况

(第一稿)

广州市妇运史料小组

一九八三年一月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广州妇女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七·七”事变前)

“广州公社”起义失败之后，在蒋介石反革命血腥镇压下，中共广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曾经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暂时趋于低潮。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更为艰巨和曲折。在蒋介石坚持独裁、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逼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们在寻求真理，探索实现民族解放，变革现实的道路，沉睡的大地，正酝酿着新的革命风暴。受过大革命影响的进步青年，成为了革命的种子。它深深地埋藏在人民的土壤之中，吸取着来自群众的营养，在复甦，在生根发芽，并终于破土而出，成长为茁壮的革命幼苗。广州人民、广州妇女，正在重新觉醒之中！

(一) 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寇对我东北三省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国民党蒋介石下令几十万东北军，不发一枪，退入关内。从此，东北河山陷于敌手，三千万同胞，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亡国奴。

在蒋介石的纵容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进驻山海关，二月占领热河省，五月国民党政府和日寇签

订《塘沽协定》，使日寇占领东北四省合法化。一九三五年五月日寇大批军队进关，国民党又与日敌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接着，日寇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叫嚣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独立。一九三六年春，日本控制下的半傀儡式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日本帝国主义已向着吞并整个中国的目标急进，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更加促使了人民的觉醒，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就连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也开始转变政治态度，逐渐转向支持和参加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接连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下，人民进一步的觉醒，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逐步兴起。

三十年代初军阀陈济棠掌管广东军政大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烟赌林立，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人民生活穷困。陈济棠是地方势力，和蒋介石有矛盾，他为了适应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有时也打起抗日反蒋的招牌，但他的本质是反共反人民的。广州地区的革命活动正是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矛盾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重新开展起来的。

（二）广州妇女的新觉醒及其斗争

旧中国的妇女受着双重的压迫，她们除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外，还有族权、夫权等种种枷锁。广东、广州的广大妇女群众，和全国妇女一样，她们政治上没有权利，社会上没有地位，经济上受人支配，生活上不能独立，求职没有机会，婚姻不能自由，受教育不平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旧礼教，把她们当成奴隶和附庸，是社会最低层。但处在广州这个开放城市的妇女，思想比较活跃，要求独立、自由尤为迫切。广大工农中流传着“宁吃开眉粥，不吃愁眉饭”的歌谣，充分反映了他（她）们富于反抗的革命精神。“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惊了中国的大地后，沉寂了多年的广州城，响起抗日的呼声，掀起救亡的浪潮，广州妇女也涌进抗日救亡的激流之中！

1、女青年学生的觉醒。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广州，各大中学校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了男女同学的罢课示威，同学们列队齐集越华路，向西南政府当局请愿，要求政府对日抗战。此后，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义勇军，并进行抵制日货。学生、老师们走向街头、码头、公共娱乐场所，张贴标语，举行演讲。随后，又进西组织下乡宣传队，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最先组织起来的四间大中学校中，省立女子中学是其中之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也动起来了，各个年级都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分别到台山、东莞、石龙、增城、石岐等地向农民、农妇宣传抗日形势；宣传东北义勇军英勇对日作战，宣传大敌当前，必须一致抗日。女师在学校中还组织了抗日义勇军，许多同学报名参加。她们每天清早进行军事训练，练好本领准备北上抗日。实际斗争的锻炼，使同学们提高觉悟，追求进步，向

往光明。不少女学生为了探索革命真理，参加了革命青年组织的读书会。一九三二年秋，女师、中大都组织了秘密读书会。女师学生在进步教师谭秀峰（何干之）、谭国标等的启发教育下，觉悟迅速提高，读书会组织得最快、最多、最为活跃。她（他）们还利用女师校刊发表文章。在女师早期参加读书会的有梁未闻、邓桂芬、张达珩、张达璐、吴绚云（革明）、伍翠云（伍乃茵）、谭本基、黄梅隶、梁丽容（梁绮）、徐侠梅（徐英）、朱瑞瑶、潘汉华、何淑仁、古丽球、张露白、黄慧清、李玉如、何琪之（谭锦芳）、伍坤顺、（朱浣）、陈婉聪等。在中大参加读书会的有杨瑾英、俞福亲（俞小曼）、李静音、余明、雷瑞英、霍赐影、张雪馨、邓贞子（邓戈明）等。这些读书会，三五人组成，也有十多人一组的，每星期或十天左右活动一次，以郊游为名到野外或在同学家里举行。交谈读书心得，议论时事，学习哲学、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和苏联进步书刊，以及高尔基、鲁迅、矛盾、巴金等进步作品。读书会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对提高青年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三四年陈济棠在广州逮捕了一批革命青年，各校读书会有有的被迫解散。有的转入秘密活动。这些读书会在大、中学生中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在广州人民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2、活跃在文化战线上的广州妇女。

三十年代，党领导上海大城市的文化战线的斗争，配合当时各项革命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团结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在广州，一九三二年革命青年温盛刚、何干之、谭国标等人，从日本回来，以教师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一九

三三年，他们得知党有扩大进步文艺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精神，便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文总”），直接由上海文化总同盟领导，办刊物、演戏、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活动内容，以中大、女师、广雅为主要据点。女师的梁未闻、伍翠云、吴绂云等都是“文总”成员。在“文总”成立以前，广州已有一些文艺团体，都有一批女同学参加。如作者俱乐部，就有女师学生几十人，伍翠云是俱乐部的总务干事，吴绂云是“广州文艺社”的成员，“文总”成立后，为适应工作需要，下设三个分盟，即“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社联”）、“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左联”）、“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剧联”）。有不少女同学参加了这些组织。梁未闻是“剧联”的负责人之一。梁丽容是“剧联”的成员。吴绂云、邓桂芬、张这衍、张达璐等都参加了“左联”，伍翠云、徐侠梅等是“社联”的成员。在“文总”的领导下，她（他）们以演剧、唱救亡歌曲，办文艺刊物，学习世界语，组织读书会等形式，开展工作。那时广州先后成立了好些剧社、剧团，锋社是其中最有规模和最活跃的，他们大演抗日救亡和进步的剧目，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女同志们在这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梁丽容、林彩容等一批女青年是锋社的主要骨干。“文总”坚持了多种形式的顽强的斗争，团结教育了群众，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而受到反动当局的仇视，派出流氓、密探破坏她（他）们的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初，当局竟公开通缉谭秀峰等人，接着又大批逮捕进步人士。伍翠云、谭本基、徐侠梅、陈婉聪等十几个女同学也同时被捕。一些同志被杀害。大部被判刑，“文总”组织虽被破坏，伍是却为广州日后的革命斗争培

养了一批骨干。

3、“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广州救亡运动的开展。

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广州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十二月十二日女师、中大、勸勤、广雅、女中、执信等大中学校，举行示威大游行。她（他）们冲教育厅，到“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北上抗日，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华北自治。为抗议国民党投降卖国，罢课一周。同学们上街头演讲宣传，还组织了下乡宣传队。数以千计的女学生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热潮。接着，即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市二中（当时是女校）召开了抗日大会，成立抗日救国会。“中大”抗日救国会派了四车人去支援她们。一月十三日她们又会同荔湾的几间学校，组织了西区大游行。这时，国民党当局，事前已作好部署，以大批特务警察穿上便衣，打着“市民锄奸团”旗号，插入队伍中，大打出手，制造了“荔校湾惨案”。在这游行中，市二中同学站在队伍前列，表现很英勇。这个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女学生们的思想觉悟，进一步的提高。大敌当前国民党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在学校则继续贯彻法西斯教育，统治学生思想，不准学生过问国家大事，更加激起青年学生的义愤，使广大青年奋起革命。女青年学生逐步认识到广大妇女群众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同国家的民主运动是紧密相联的。她们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一面走出校门，冲向社会和广大人民一道，参与和组织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六年初，广州成立了“民众抗日救亡歌咏团”，各大中

学校的男女生和工农群众都纷纷参加。例如女师的许多进步学生周中大、执信、女中、教忠等校的不少女学生都积极参加了。“歌咏团”设在长堤“男青年会”。它是以唱歌为形式，从中宣传抗日救亡。为了更好地发动和团结广大妇女群众，由谭本基、黄梅隶、李静音、邹剑卿四人发起，又组成了“广州妇女抗日歌咏团”。团员约二百人，大多数是女学生和职业妇女，也有少数家庭妇女参加。活动内容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为主。每周有两、三个晚上教唱。地点在“女青年会”礼堂。从六月开始到冬季，时间延续了几个月，后来，由于天气渐冷而结束。这是妇女界一项较有规模、影响较大的活动，在妇女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对启发民族意识，鼓舞斗志，加强她们挽救危亡的责任感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妇女骨干，为以后妇女运动的开展，准备了力量。

一九三六年前后，广州创办了“儿童周刊”负责人中有黄梅隶，积极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中大的俞福亲和李静音等，出版经费靠募捐。它的主要宗旨和任务是发表儿童文学作品、诗歌等，以激发少年儿童的爱国心。这是一个秘密出版和发行的油印品，一直坚持办了两年，对于启发教育儿童少年，起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广大妇女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妇女和女学生已经出头露角，在学校、在社会、在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和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党组织重建后，妇女工作的新发展

一九三六年夏，广东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十月，中共广州市

委正式成立。第一批发展的共产党员中就有女同志李静音等，接着又吸收了谭本基、梁绮、黄梅衷等人。到“七·七”前参加共产党的女同志就更多了。例如伍坤顺、俞福亲、余慧等。从此，广州的妇女运动，又重新取得了党的正确领导。

在全国抗日运动逐渐兴起的有利形势下，中共广州市委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一九三七年初，中共广州市委为加强妇女工作，成立了党的妇女支部。支部成员先后有李静音、谭本基、邹剑卿、黄梅衷、汪梅、杨瑾英、伍坤顺、梁薇娟等。李静音、黄梅衷、谭本基先后担任过这个支部的书记，妇女支部的成员后来都是开展妇女运动的主要骨干。

有了党的领导，广州妇女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确，力量也大大加强了。党强调了把妇女解放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指出要在妇女群众中开展串连发动工作，对妇女进行启蒙教育，通过读书会、时事座谈、妇女问题讲座等形式，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和妇女运动的基本理论。组织青年知识妇女和女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定期汇报和座谈，从中发现和培养救亡运动的骨干，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并且通过她们，组织和发动各种革命斗争。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压制革命人民的斗志，压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一直在推行愚民政策，提倡尊孔读经，企图把青年学生引向不问政治，不管民族危亡，任从统治者摆布的局面。一九三六年秋，省教育厅组织了赴日本参观团，女师校长李雪英和女中校长李瑞芳参观回来之后，她们在女学生中大肆宣扬日本妇女的“贤妻良母”精神，要求女同学们学习日本妇女如何对待丈夫等

等。这事遭到广大女学生的坚决反对。（如陈学贤、徐舜英、徐碧翘等）。女中和女师的学生配合进步的小学教师，开展了反宣传活动，散发了传单。如女师校园里张贴了“反对奴化教育”的大标语，不少女同学在报告会场上，纷纷质问学校当局为什么要搞日本式的奴化教育，反对“读书就是救国”，要“走出课堂去”，“走出厨房去”、提出“只有抗日才能救中国，妇女才能求解放”等的口号。女同学女教师的这一场英勇斗争，揭露了学校当局一些人的亲日、媚日的丑恶咀脸，粉碎了他们的反动阴谋，革命青年妇女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伪军侵犯绥远。在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下，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十一月击败了日伪的联合进攻，收复百灵庙。这一局部抗战的胜利，振奋了人心，得到广大人民的捐献和慰问。十二月市妇女会及省女中、女师和真光、洁芳等校许多女学生积极参加了“援助绥远抗日部队”募捐、节食和义卖活动。将所得款项和所制寒衣，全部捐献给绥远前线将士。

“西安事变”后，抗日救亡呼声日益高涨，形势发展很快，省市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结合广州地区情况，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通过合法组织形式，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工作，党组织通过一些关系派俞福亲、李静音打进国民党的市妇女会，从上面取得了当时妇女会的理事长郭顺清的信任，发动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妇女入会，使我们在妇女会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黄梅隶、张越霞经常听取俞的汇报和布置党的工作。以后我们的女共产党员和妇女骨干又利用妇女会的名义，在河南一带的纺织厂、橡胶厂举办识字夜校，从中开展女工工作，

并在河南成立了广州市妇女会海幢分会。由李静音、伍坤顺同志共同负责这个分会的活动。

这时期的妇女运动的开展，为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的广州妇女

（一）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新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的民族义愤。“七·七”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提出立即开展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日军大举进攻和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下，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参加了抗日战争。抗战的怒火在全国燃烧，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七·七”事变后广东国民党统治当局，仍然坚持反动政策，各派势力之间还是明争暗斗，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也威胁到他们的权益和地位。在全国群情激昂，人民奋起抗日之时，他们也顺

应时代潮流，赞成抗日救亡，支持成立群众团体和开展救亡活动，以期从中谋取自己实力的发展。因此，总的形势是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的。各阶层人民逐步卷入了抗日救亡浪潮之中，各种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广州先后成立的抗日团体共有几十个之多。其中有好些妇女组织。

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动员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初，新成立的中共广东省委和改组了的广州市委都先后成立妇委，增设妇女工作部。当时省妇委书记是张越霞（同时又是省妇女工作部的部长），妇女委员有区梦觉、黄梅隶、曾珍等。广州市妇委书记是黄梅隶（兼妇女工作部部长）。在此同时，省、市委还专门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梁丽容、曾珍、俞福亲等参加了训练班。班里用马列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武装妇女干部，促使妇女工作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这时期的妇女工作贯彻执行了广东党一九三八年的工作总方针，即以建立党的组织为中心，开展群众运动，积极参加国民党当局所号召和领导的团体，利用国民党中较开明人士，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此，各级党组织首先注重在大、中学校女青年、女教师和工厂女工中发展女党员，建立了好几个妇女支部，为开展妇女工作打下了组织基础。

（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广州妇女运动的发展

党的正确领导，推动了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也促进了妇女运动的迅速发展。这时期的妇女运动有它的特点：这就是：1、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心内容，各阶层妇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动；2、在

广大妇女群众中最先起来的是青年女学生，她们走出校门，走向工农妇女，在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3、充分利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运用一切合法组织，使妇女工作得以顺利发展；4、广大妇女活跃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各个方面，在宣传发动群众，在组织抗日支前工作，以至在组织军事训练等等方面，妇女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了广州妇女的力量和不可缺少的作用；5、妇女队伍受到了锻炼，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并为今后革命斗争，培训了大批骨干。

在抗日高潮中，广州的妇女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迅速发展起来。

1、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女青年学生

旧中国的女学生们，大都是挣脱了封建婚姻、家庭和社会的重重束缚，才进入学校读书求学的。她们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有条件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是最先觉醒的妇女大众。她们迫切要求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妇女自身的解放。因此，女青年学生中的进步同学，积极投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和男同学一道，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急先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市高中学生军训团女生队（市二中、市美术学校学生）就冲出军训团，参加了全市纪念“三、二九”大游行。中大、中大附中、省女中、省女师、执信、广雅、市二中等校的女同学们，在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支前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象省立女中就是救亡运动最活跃的一间女校。抗战开始不久，省女中就迁至顺德良滘。女中有学生党员，建立了学生党支部。学生们在共产

党员余慧、徐华淑、余珍等人带动下，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救亡工作。她们组织读书会，举行时事讲座，成立戏剧队，歌咏班，到沙溪、龙江、西樵、大良、石岐等地宣传演出。她们筹募白银捌百多元，捐献给英勇奋战的八路军。在校内她们联合进步教师，在各班级组织“姐妹班”，带动各班，共同工作，共同进步。她们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深入学校附近工厂、农村，开办民众夜校，组织女工、儿童读书识字，教女工们唱抗战歌曲，谈抗战形势，讲解革命道理，介绍苏联妇女地位和作用。使女工们懂得妇女要争得婚姻自由、生活独立，首先要参加抗日救亡，只有取得民族解放，才能取得妇女解放。同学们发动了女工参加救亡工作一起到圩镇演讲、唱歌、演戏。她们还支持女工同资本家尅扣工人工资开展斗争，从中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女工骨干，在她们中发展了共产党员。在开展革命工作过程中，常常遇到当地反动势力和校方的威胁与破坏。如在夜间布置流氓、地痞埋伏在黑暗处，恐吓、骚扰外出工作的女同学；学校还借故公布开除余慧、徐华淑、余珍等人，以图扼杀同学炽热的爱国抗日火焰。但这些都给同学们一一击破，既没有屈服于反动的势力，还对开除同学的事件，据理力争，迫使校方取消了无理的决定。斗争取得了胜利，越发激起同学们的义愤，她们增强了团结，更加深入到女工群众中去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省立女师的女学生，在革命老师谭秀峰、谭国标等的启发教育下，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学生除了在校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外，不少人还参加了校外的救亡团体的工作。有的参加“锋社”剧团的演出；有的参加“抗战教育实践社”的工作，如徐侠梅、黄梅、郑鲁秀、朱瑞瑶等。抗战教育实践社结

束后，又组织和参加了“流动工作团”，到东莞、宝安等地农村，开展农村宣传工作，动员农妇努力支前。

中大的俞福亲、霍赐影、雷瑞英、张健，中大附中的陈柏如（夏冰）、钟锦霞（后改名钟路）、黄仪珍（已逝世）、周伯明汪梅，教忠中学的李琼英、陈坤仪、徐静如（张逸）等，都是抗日救亡工作中的积极分子。这些人中，有的还参加到“中大”进步学生钟文杰、华嘉等领导的“战时文化服务团”，深入到街头、工厂、农村，演出街头剧、话剧，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俞福亲等还和中大的男同学一道，深入石牌农村，开办农民夜校，帮助农民学文化，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她们走出校门，接触社会，面向工农，发挥了知识妇女在革命中的桥梁作用。

2、在国民党的妇女组织中开展工作

还在“七·七”事变前，中共广州妇女支部就已安排了李静音、俞福亲（现名俞小曼）到隶属于国民党市党部的妇女会里去工作。抗战爆发后，她们加紧做妇女会的理事长郭顺清（市妇女会负责人，中间派，表现还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团结工作，争取她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利用妇女会的合法组织，面向基层，开展妇女群众工作。陈宛聪、潘若茵、陈泳椒等一班人以市妇女会名义，组织了两个战时工作团，每个团约有一百人，团员是自愿、义务参加，流动性较大。她们带领着这两个团，深入到工厂、学校去，在河南女工集中的纺织厂、橡胶厂、织带厂等处，参加女工们的劳动，和女工们谈心，举办夜校、识字班，对女工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和三防（防空、防毒、防奸）教育。谭本基等同志还积

极组织和发动女车衣工人等为前方将士义务缝制棉衣，仅河南区就动员了女工、家庭妇女一百多人，日夜赶制棉衣，得到社会的好评。黄梅隶、周玉贞等，则以妇女会的名义，到小北一带农村办农民夜校，同农民交朋友，教她（他）们读书识字，宣传抗日，组织农妇参加支前工作，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从知识妇女转到广大工农妇女。在学校中，则组织女学生参加义演，劝募等抗日救亡活动。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后来又加派了梁薇娟到妇女会工作，主要是负责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梁和党支部成员上下配合，互通情况，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妇女支部的领导黄梅隶、谭本基等经常听取她们的工作汇报，传达上级党的意图，布置她们开展工作。使一个当时只有一个四、五十岁老太婆看守门口，徒有虚名的妇女会，成为我党开展妇运工作的好场所，贯彻了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对于动员妇女群众抗日救亡，培养妇女干部；对于促进妇运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妇女会还出版了《妇女知识》月刊，由梁薇娟负责主编。刊物内容丰富，有政论性的文章；有宣传我党抗日的方针政策；有报导各地抗日救亡和妇女运动的文章、通讯。有关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的政论性文章和妇女抗日救亡的活动情况的报导，大多是由党组织提供材料，由梁薇娟、伍坤顺以及各方面参加实际工作的女干部执笔撰写而成。《妇女知识》每月出版一期，公开发行几千份，从一九三七年底创刊到广州沦陷前夕停刊，共出版了十期左右。这是广州市在抗战时期的妇女刊物，它对于宣传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支援前线和发展妇女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在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提高妇女群众的思想觉悟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3、在各抗日救亡团体中，妇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与文化界人士协议，组成“救亡呼声社”，创办“救亡呼声”期刊，由他自任社长。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工作，派了伍坤顺同志（共产党员）到该社去。主要任务是争取李峙山（湛小岑之妻是该社妇女组的头头）和陈明淑（广州市政府第三科长陆宗琪之妻，是该社妇女组的成员，比较开明），取得她们的支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救亡呼声社”的妇女组，白天，三五成群，打着旗子，走到街上，开展街头演讲，大讲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狠残暴，讲抗日救亡的迫切，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动员大家奋起抗日，群众鼓掌叫好，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要求，深入人心，群众受到教育，宣传者也受到鼓舞。姐妹们都以能作为一个救亡的积极分子而自豪。她们还以“救亡呼声社”妇女组成员的身份，在惠爱路的天主教堂，举办女工夜校，对女工进行识字教育和大唱救亡歌曲，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大讲平型关的胜利，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动员和组织女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课后还深入到女工家里访问，进一步向她们宣传抗日的道理，说服她们的母亲、丈夫、婆婆等支持她们参加社会活动，由于夜校办得出色，还得到湛小岑的表扬。她们抓住时机，再办了另一间夜校，又多设了一个宣传抗日的讲台，联系了更为广泛的妇女群众。

由于李峙山抗日救亡的积极性不高，在她控制下的妇女组难于大刀阔斧开展工作。而陈明淑抗日积极性较好，个性比较泼辣。伍